



中国翻译名家自选集

叶君健 卷

阿伽门农王

中国工人出版社

I/13
2

中国翻译名家自选集·叶君健卷

阿伽门农王

埃斯库罗斯 等著
叶君健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D1158/31 21
(京) 新登字 14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伽门农王/叶君健编.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4. 9

(中国翻译名家自选集丛书)

ISBN 7-5008-1720-7

I. 阿… II. 叶… III. 文学-作品-世界-选集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3152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次:	1995 年 8 月第一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字数:	328 千
印张:	14.375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20.80 元

翻译路上的足迹

叶君健

三十年代初期，国难当头，日本法西斯军队在中国长驱直入，国家的命运危在旦夕。1932年日本军队攻打上海时，我正在这个城市。我一直沉迷于理工的课程，希望将来能当个工程师，为国家做点实际工作。那年我正好考上大学，我选了社会学这门学科。读了一年以后，我又觉得这门学科太抽象。在那以前我已经涉猎过一些文学读物，也注意到当时正在兴起的“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我得知鲁迅、郭沫若和夏衍等文化人物最初都是学科学的，后来因时代的需要全转向到文学。到了大学第二年我便也转到文学，读外国文学系。

作为这个系的学生，我当然主要是研读外国文学。阅读外国的文学经典著作，自然应该直接读原文。那时在课堂里使用的语言是英语，教授——也包括聘来的外籍专家——都用英语授课，我们学生也用这种外语与教师交流。虽然我也选了法语作为副科，但没有通过它学外国文学。甚至法国作家如福楼拜、法朗士等人的作品，我也是通过英文译本阅读；其它如俄国十九世纪的名著《战争与和平》、《复活》、《罪与罚》、《父与子》、《烟》等等，我也是通过英译去研读。读这些大师们的代表作，每当我遇到一些特别引起我心灵激动的段落，我也跃跃欲试，想把它们转化为中文，作为散文，供不谙外文的国人欣赏。但这类作品与当时国家的气氛对不上口径。我开始尝试翻译的是东欧一些长期受外国统治或控制的弱小民族国家的作品。那时，这

些作品只有通过世界语才能读到。世界语发源在波兰，它的创造者是个犹太血统的波兰眼科医生。在沙皇搞“分而治之”的政策下，他出生地的一些少数民族相互敌视，往往为点小事而争斗，结为世仇。他认为这种局面起因于彼此的语言不通，因而造成了许多误解和敌意。他向世人公布世界语的方案，目的就是增进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友好相处，达到世界和平的目的。这种国际语言立刻在东欧和旧俄知识分子中间转播开来，他们真的把它当作思想交流的媒介而推广。有不少作家还把他们的民族的文学作品译成世界语，推向世界人民中间去。我是在中学自修学会这种语言的。我发现东欧一些弱小民族作家的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和思想，倒是与我国广大人民当时的感情很接近。我读它们受到感动时也情不自禁，作为练习，把我最受感动的一些篇章译成中文。这就是我进入翻译工作领域的开始。

我正式发表翻译作品是1933年。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大恐慌，从美国纽约华尔街展开，波及全球，这种象征资本主义经济全面崩溃的现象，在许多有头脑知识分子中间引起强烈的反应。他们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如在德国，甚至美国本身。日本法西斯军阀，虽然在中国急剧展开侵略，但在他们国内的知识界中进步趋势却在明显地显示出影响。像小林多喜二这样的革命作家和藏原唯人这样的评论家在读者中都有很高的威信。甚至正统派的大型综合刊物如《改造》，也发表进步作家的作品。日本的世界语者也组织了“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者联盟”（后来到中国参加抗战的日本女作家绿川英子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日本的进步人士也将本民族的一些进步作品翻译成了世界语，向世界介绍。其中有一篇名《被驱逐的人们》（小中篇）他们也将其译成了世界语，作者名张赫宙，是朝鲜人。他用日文写作，原文也发表在《改造》上。故事的主人公是朝鲜的一家老百姓。

他们被日本统治者强迫离乡背景，移民到中国东北“开发”。我把这篇作品译成了中文，投寄到当时著名的大型综合刊物《东方杂志》，不久就被发表了。

这在我说来是一件大事。这说明我学外文有用了，我读的外国文学也可以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翻译作为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便也在我的心里扎下根来。我用世界语——以后又发展到英文，甚至日文——报刊上看到一些有现实意义的东西，要么直接翻译，要么编译，寄给我认识的一些报刊编辑，绝大部分都发表了。因为这些东西大都是以影射的方式，攻击国民政府不抗战和贪污腐化，发国难财，所以我用的都是笔名——为了避免特务的注意，几乎每一篇就用一个新笔名。这些笔名，我现在只能记得一个：陈广皮。我能记得它，是因为我小时身体弱，不时吃药，其中有一样药名“广陈皮”。我把它改头换面，作为我的名字，对它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于此同时我开始课余写小说。但不是用中文写，而是用世界语。我的意图，像东欧那些弱小民族国家的世界语者把他们民族的作品译成世界语一样，我是想把我国底层小百姓和小知识分子的凄凉境遇告知世界人民——特别是弱小民族国家的人民。1935年，在大学毕业的前夕，我已经完成了一部用世界语写的短篇集，名《被逃亡的人们》。这是我的处女作，1937年由上海一批世界语知识分子组织的出版社绿叶书店出版。由于它是东方世界语者用世界语创作的第一部原作，它在国际世界语的文学史上至今仍占一席位，但在国内谁也不知道，只有最近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世界语文学”这个条目里谈到了它。

显然我搞翻译工作，与我们对这个词的涵义的一般理解有些距离。我在大学毕业后两年，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在这个框架下，武汉成立了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阳翰笙任

秘书长，我在负责对外宣传的第七处做外事工作。我日常为之一忙碌的工作就是翻译——译许多文件，包括把抗日战争的一些报告文学译成英文，也为领导同志接见外国来访的记者和文化人当口译，还负责将我们的广播稿译成英文，然后我在电台上把这些译文向国外广播出去。这些工作过去从没有人当成是翻译。只有现在中国翻译家协会才把这个类型工作的看成是翻译家，吸收他们入会，协会下面还设有专门委员会，研究翻译方面的艺术。

1938年秋，日本法西斯军队攻占了武汉，我转移到香港。由于在“三厅”工作时所养成的一种职业惯性，我又半自发地，半有领导地搞起翻译工作来了，而且是日以继夜地搞，使用的语言除了英文之外又加了世界语。我用英文翻译了许多有关抗日的文章，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阶段》（大概是《新民主主义论》的最初蓝本）以及八路军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打游击战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闹磨擦的小册子，等等。我还用英文和世界语翻译了诸如刘白羽、张天翼、姚雪垠等作家的小说。这些译文都在国外的报刊上发表或出版社出版。在文学方面，作为我这个时期翻译工作的成绩，我在香港出版了两部翻译小说集《中国战时短篇小说集》（英文，Wartime Chinese Stories 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和《新任务》（世界语，Nora Tasko，香港远东使者出版社出版）。

在香港沦陷的前夕，我辗转来到陪都重庆，我所做的中译外的工作只好告一段落了。我只能到大学教英文和外国文学，先在重庆大学，后在复旦大学和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重庆不是做我那个类型的对外宣传的环境。不久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合作也正式结束，白色恐怖开始笼罩着整个山城。我们访友都要提高警惕，怕后面有人钉梢。在教课之余，我还想做些我力

所能及的文学工作。在当时环境下，创作都谈不上，更谈不上用英语和世界语创作了。这时翻译便成了我的主要业余活动。我彻底调整了我的想法，把业余的精力严肃地投到翻译上面去。从1941年起我开始从英文和法文译了些小说，如梅里美的《加尔曼》和老托尔斯泰的《幸福家庭》。但我想把这项工作做得更有系统一点，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能产生一点实效。于是我便课余时间研究起西方戏剧来。我想在这方面做点有系统的工作，即翻译全部我认为有代表性的作品。

首先是古希腊悲剧，我译了埃斯库罗斯的三大悲剧之一《阿伽门农王》，接着我译了十九世纪比利时象征派戏剧家梅特林克的《乔婉娜》和二十世纪现实主义作家易卜生的《总建筑师》。前者发表在我的一位同事孙晋三（中央大学外文系教授）编的《时与潮文学》杂志上。后两部剧作分别由重庆建国书店收入《欧洲当代名剧选集》丛书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总建筑师》是易卜生晚年的作品，颇富诗情和浪漫主义气氛，写的是一位总建筑师，到了暮年仍不放弃他的权威，在一幢巨大的建筑完工的时候，他仍要爬上顶峰，做最后的加工，但衰老不饶人，他终于从屋顶上坠落下来，得到悲惨的结局。

当然我的翻译工作不单限于戏剧。我还为冯亦代与他的几位同好办一个名为“古今书屋”的出版社主编了一套西方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当时我所在的中央大学和与我私人交往上有联系的西南联合大学的外国文学教授们，课余也译些西方古典名著。当时我所在的中央大学和与我私人交往上有联系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们，课余也译些西方古典名著，我把他们的译文组织起来，收进这个丛书，陆续出版。但这都是五十多年以前的事。这些书当时都是以土报纸印刷的，经过多年的变乱，现在一本也找不到了，甚至它们的书名我现在也记不清了。除了这

些以外，我还从驻重庆一些英美记者（他们当时都同情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和八路军在前方的英勇抗战）那里借来新近出版的西方书报，从中选译了一些以反法西斯战斗为内容的小说，以激励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其中后来出了单行本的有两本小说——美国斯坦贝克的《月亮下落》和捷克斯蒂芬·海姆的《人质》。它们也是在重庆用土报纸印刷的，现在也彻头彻尾失踪了。

1944年我应英国战时宣传部之聘，赴英国各地巡回演讲中国以贫苦农民组成的、装备落后的军队——主要是八路军和新四军——所展开的抗日游击战争，以激励英国人民的士气，作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准备。我那时还是个年轻人，在英国各地老百姓中间奔走，这也算是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工作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曾经为战争服役过的人，我得到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一笔助学金，在剑桥大学研究欧洲文学。在工作之余，作为头脑的调剂，特别是在晚间入睡以前，我喜欢看一些欧洲的童话，其中安徒生的童话最能吸引我——我早年在国内念中学时在英文课本中就已读到过一些选篇。那时战争虽然已经结束，但生活仍然非常严峻，按战时定量分配的标准过日子，每星期只能吃到二两肉和一个鸡蛋。我在丹麦和瑞典的朋友们常常在寒暑假期间请我到他们家去作客，借此也改善一下伙食。我成为了丹麦的两个家庭和瑞典一个家庭的常客，因此我也学会了阅读丹麦文和瑞典文。我开始直接从丹麦文阅读安徒生童话的原文。这一阅读使我的眼界大开：我在英文和法文中读到的那些安徒生童话只不过是故事，而失去了安徒生童话中的诗，诗的意境和人生哲学。安徒生的原文童话给我带来极大的快感和启示，但在西方的译本中这些特点都没有了。安徒生的童话，用他自己的话说都是“为孩子们讲的故事”（安徒生

在他最初发表的第一、二、三集童话，都以此作书名）。我回忆我儿时在中国山村的私塾里读《四书》、《五经》的情景，从没有接触过这样的童话，真是枯燥极了。于是我联想到，中国的儿童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品种，贫弱得也实在可怜。它需要大大地发展，因而也需要借鉴。像我前不久在国内翻译戏剧名著一样，翻译安徒生童话的念头便开始在我心里扎下了根，由此我幻想在中国新儿童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作出我的一点微弱贡献。于是我便业余开始翻译起安徒生的童话来。我的方法是直译。好在安徒生的童话是为了“讲给孩子们听的”，行文简洁、朴素、流畅，我直译也不会使中文变得生硬。由于这些童话充满了诗情画意和关于人生的思想，我选择中文词汇时也着眼于表达这个气氛。

我在剑桥住了五年，业余时间几乎全都花在安徒生全部童话（共160多篇）的翻译上。因为中国即将全部解放，我于1949年末装返国。安徒生童话全部的中文框架已经基本上搭好了。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国的文学事业开始蓬勃发展，儿童文学作为一个新的文学品种也崭露头角。我开始感觉到，把安徒生全部童话介绍给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孩子们，正是时候。不仅如此，为了推动我们根底不是太厚的新儿童文学向前发展，我觉得我也应该尽自己的一点力量。我开始自己也业余写起儿童文学作品来（在剑桥时我已经用英文写了一部长篇童话，名《雁南飞》，在伦敦和巴黎出版，前不久我自己把它译成中文，将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参与这方面的活动。事实上这也是解放后我业余活动中的主要工作之一。当时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任总编辑的巴金得知我所作的有关安徒生的童话的翻译工作，就叫我把译稿交给他们出版社出版。第一分册的中译本安徒生童话《没有画的画册》就于1953年由该社出版了。以后各个分册陆

续与读者见面，直到1958年全国出版社调整，文化生活出版社并入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通知我，说他们要出安徒生童话的全集本，我自然同意。

于是，我又回到丹麦文原作，把我已发表过和未发表过的中文译文，作了逐字逐句的校订——几乎等于是个新译本。《安徒生童话全集》，就这样第一次在中国出版了，共十八册。

我想在这里附带提一笔，即从1953年起翻译工作成了我的专职。但这是一种不同性质的翻译工作。原来，我回国后即被分配到文化部搞外事工作。我发现中国解放区有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世界人民一点也不知道。我便组织专家把它们译成英文。于1951年出了一本近40万字的丛刊，名《中国文学》，1952年又出了一本，1953年更进一步，出了两本。这时专门从事对外传的外文出版社成立。我编的这个丛刊已经在国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上级领导认为这是新中国的一项新兴事业，应继续出下去，并改为期刊，定期出版。于是我便被调到外文出版社。专职编这个刊物——先是季刊，后改为月刊。没有想到这一编就是几十年。我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出版社，最近才离休。这事实上是一个翻译刊物，即把中国的文学作品译成英文——后来又出了法文版。我作为总负责人，自己翻译，也处理别人的翻译，从中文选题到读英文清样及最后定稿，样样都亲自经手。作为翻译工作之一种——中译外——这里面当然也有许多经验，但在这里没有必要去谈。我一生最好的时间——即三十多岁到六十多岁——都花在这项工作上去了，翻译了字数好几千万，我当然也有“自留地”，那就是业余时间和节假日，我利用这时间译了些外国的儿童文学作品，自己也写些童话和故事，为中国新兴的儿童文学事业添点砖瓦。

这期间，我也意识到我在抗战时期做的一点外国戏剧研究

和翻译工作，还留下了一个尾巴未收。于是我补译了意大利的喜剧大师哥尔多尼的剧本《扇子》，此外还译了一部获得了世界声誉的当代挪威儿童剧作家埃格纳的三幕儿童剧《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上演了这个戏，最近新加坡也上演了我译的这个剧本。剩下的一些业余精力我就用来翻译了一些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主要是中篇和短篇小说及童话，如《拉比齐出走记》、《南斯拉夫童话集》、《朱童与朱重》等。它们的作者都是来自我们不曾注意到的一些较小国家如南斯拉夫和挪威等，但他们的作品都已经成为了世界公认的名篇，与这项业余工作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是我个人的儿童文学创作。

回顾起来，从1933年我正式发表的一篇翻译小说起，整整60年过去了。在这60年中，中国经历了巨变，世界也经历了巨变。我虽然是个平凡的知识分子，但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被卷进去了。中国的抗战、欧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我都沾了边。甚至解放以后，国家统一了、安定了，我也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被卷进了历次政治运动和最后的大动乱“文化大革命”。在这些汹涌澎湃的大潮中，我只有钻一些间隙的空子，见缝插针，写些创作和作些翻译。在后一项领域中我的工作方向及所作选译的作品，都与我前一代的翻译家不同。这是因为我非超人，钻不进象牙之塔——也不愿意钻，只能心甘情愿地接受时代的约制，写译些我认为与时代合拍的东西。它们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换句话说，我的译作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时代的制约。它们也说明了像我这样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大动荡的时代中感情和内心跳动的节拍。

目 录

翻译路上的足迹.....	叶君健(1)
[古希腊]埃斯库罗斯	
阿伽门农王.....	(1)
[意大利]哥尔多尼	
扇子	(84)
[挪威]易卜生	
建筑师苏尔纳斯.....	(190)
[比利时]梅特林克	
乔婉娜.....	(290)
[挪威]埃格纳	
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	(362)

埃斯库罗斯

阿伽门农王

登场人物

(以出场先后为序)

守望人

城中老人所组成的歌队

克吕泰墨斯特拉

阿伽门农

卡珊德拉

埃癸斯托斯

景：在阿耳戈斯^①地方，阿伽门农王宫殿面前的一块空地上。夜。宫殿屋顶上的一个守望人。

守望人

我要请上帝 不 让我再作守望，
我象一头狗似地度夜已有一年时光，
在阿特柔斯^②儿子们的屋顶上支着肘观望，
于是我认识了夜里群星的聚会——
那些带给人间夏天与风暴雨狂，
罗列天空中的、闪耀着的帝王。
我知道了这些星星的升和降。
我现在等待着烽火的信号，
它将从特洛伊^③带来消息，
报告那儿的沦陷。这件工作是一个
血心肠的、有一副男人头脑的女人交我办好。
当我要在这潮露里试作一会不可能的假寐，
我的夜却不见梦儿来到：

① 阿耳戈斯 (Argos)：阿伽门农的王国，在希腊，所以在荷马的史诗中，阿耳戈斯又有希腊的意思。

② 阿特柔斯 (Atreus)：贝洛甫的儿子，提厄斯忒斯的弟兄，阿伽门农和墨涅拉俄斯的父亲。密逊纳 (Mycenae) 的君主。

③ 特洛伊 (Troy)：小亚细亚一城市。希腊人对它的远征形成有名的“特洛伊之战”。

因为伴我的是恐怖而非睡觉。
所以我不能闭起我的眼儿睡一宵，
当我要哼唱一支歌
来治疗我的睡眠，每次我就要哀叫，
为这一家的命运而泣而号：
它已经不象以往，一切秩序都好，
可是愿好运降临，离开苦恼。
好消息已能从这夜半的烽火看得到。

〔暂停。一道光现了出来，渐渐地增大——烽火的光。

啊！夜的火把，我向你敬礼，
你的光象白昼。在阿耳戈斯城里
跳起种种舞蹈，庆祝和平。
我要喊阿伽门农^①的女人，
快走下床来，在这房子里
快乐地高呼，对这火把回礼：
因为特洛伊城已经攻陷——
这就是那火焰招手的明白消息。
我将先跳起单人舞，
因为主人的运道也就是我的运气——
这烽火即给了我幸运的这么一击。

愿他——这一家之主——回到家来，
我将要把他的手紧紧握起，
无别话可讲：所谓一头巨牛

① 阿伽门农 (Agamemnon)：希腊远征特洛伊军队的统帅。